

德
国
史

革命暴發前之德國

一八五一年九月於倫敦

歐洲大陸革命劇的第一幕已經閉幕了。在一八四八年大風暴以前的『過去的權力者』又成爲『現在的權力者』了。在一個時候，曾多少受人歡迎的統治者，如臨時總督、迪克推多、三頭委員會、以及附在他們後面的尾巴如代議士、民政委員、軍政委員、縣知事、司法官、將軍、官佐、兵士，現在都被驅逐到國外，或者『遣送出洋』，亡命英美，在那裏組織有名無實的（*in partibus*

infidelium)新的政府，歐洲委員會、中央委員會、國民委員會，其發表成立宣言之堂皇，儼然如不虛假的權力者。

歐洲大陸的革命黨——或諸政黨——在戰爭前線處處遭逢失敗，比這更嚴重的失敗，我們是不能想像的。但這算什麼？英國中等階級爲爭社會的及政治的統治，不是經過了四十八年的，法國的，不是經過了四十年的無比的鬥爭麼？他們不是在勝利快達到時，而忽然帝制復辟，反感覺得他自己比從前更加穩固些麼？在往昔的時代，人們總將革命歸咎於少數煽動者的惡意。現在這種迷信時代，是早已過去了。現在凡人都知道凡有革命震動的地方，必有社會的要求爲其背景，這種要求爲陳舊的制度所阻，不能得到滿足。這種要求或一時不爲人民所普遍的和強烈的感覺，足以獲得目前的勝利，但是凡企圖用暴力壓迫他的，祇有使此要求伸張和擴大得快，直到打破那束縛他的鎖鍊之日。假使我們被擊敗了，我們除了再從頭幹起外，更無其他辦法。幸而在這運動的第一

幕閉幕，第二幕未開的中間，我們有一個或者很短的休息時間，可以做一點十分必要的工作：研究這次革命勃發和其失敗的原因。這些原因，我們不應當在少數領袖的偶然的努力、個人的才智，或其錯誤過失，或其背叛中尋找；而當研究這受過革命震動的國家的社會和生活狀況。一八四八年的二月和三月所突起的運動，不是少數個人活動的結果，乃是全國民的要求，（每一個國家的各階級，對於這種要求，都已深刻的感覺着，雖然他們對於牠的了解清楚有不齊的程度）勃然自發的，不可遏止，表現而為示威的行動，這是一般人公認的事實，但是倘如你研究反革命的成功之原因時，你就從各方面聽到一種現成的回答，不是某甲就是某乙背叛了人民。這個回答，依照實際情形判斷，或者是正確，或者是錯誤，但牠完全不能解釋事情，牠不能指出為什麼人民允許他們被人如此叛賣。而且，假如一個政黨，他的政治資本，只在於認識某甲之不可信賴的孤零的事實，他的遭際又是如何的可憐呢？

況且研究和暴露革命的爆發及其失敗的原因，從歷史的觀點說，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一切個人的瑣碎的爭論和攻訐，一切相互矛盾的聲明，如說這是馬拉(Marrast)或萊得魯·羅蘭(Ledru Rollin)或路易布朗(Louis Blanc)，或臨時政府的其他閣員，或臨時政府的全體，這是他們把革命之舟，駕駛到觸礁以至於沈沒的，這些說法，這種攻訐，對於英美讀者有何興趣及教訓呢？英美的讀者從遠處觀察這複雜的運動，只見其包羅萬象，而無暇辨別其動作的詳細情形。而且我們知道，沒有一個知覺清醒的人會相信法國二月革命後，臨時政府的十一位閣員（他們中間的多數，為善為惡，均係庸碌之才），能在三月之內，傾覆三千六百萬人口的國家，除非這三千六百萬的人辨認前途的能力，和這十一個人不相上下。但是這三千六百萬人口如何立刻被召集來決定應該走什麼路，如何他們只是在微光中摸索，迷失路途，以致他們的舊領袖得以一時的恢復其領導地位，這才是真正的問題。

因此我們如要在講壇報的讀者面前論列一八四八年德國革命爆發的原因，及其何以必然得到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〇年暫時失敗的結果，我們不準備敘述該國事變經過之全部的歷史。將來的事變和後代的評斷會決定那一大堆亂雜無章，表面上似乎是偶然的、矛盾的、錯綜的事實中，那一部分當在世界史中占一地位。做這工作的時機尚未到來，我們此時當以可能者為限。假使我們能根據不可否認的事實；找出合理的原因，解釋主要的事變和運動的重要階段，而且使我們能了解下次——或者在不遠將來的下次——德國人民革命爆發所走的方向，假使我們能做到此點，我們即認為滿意了。

第一，革命爆發前之德國的一般狀況是怎樣呢？

一個國家內部的階級結構，是其政治組織的基礎。德國的此種結構，比別國更為複雜。封建制度之在英國與法國，是早被摧毀了，或者有如英國，封建制度減縮至很不重要的形式，因為英國有强有力的富厚的資產階級，集中於大

著名的經濟學家李斯特描寫當時的德國情形說：『德國有三十八道稅關，妨害國內商品的流通，一如人身上每一血管有意的與別的血管隔開，不許血液由一血管流入別一血管一樣。假使漢堡要與奧地利或者柏林與瑞士經商，則商人須經過十個國家，要研究十種完稅制度，和需要十次的納稅。誰要是不幸住在三四國交界的地方時，那麼他就要在這些國家的互相仇視的收稅吏中間，度過一生……』

德國分裂的原因，主要的是受了外力的壓迫。

德國自十九世紀初葉（或者還早些），正在一最受壓迫的時代，主要的是法國對牠的壓迫，其次是俄國。侵略者對於德國分割了許多次數，使牠分崩離析，他們分割牠的領土的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使其直接或間接的隸屬於自己。在特申和約（一七七九）的時候，俄國與法國共同瓜分德國的領土。在的爾西特和約（一八〇七）中，普魯士喪失了許多土地，只剩下二八五六方英里的土

地和四百五十萬的居民。而且拿破崙組織萊因聯盟，使萊因的一些小國隸屬於自己，命令這些聯盟的諸國家，於法國與任何外國宣戰時，甚至於與德國宣戰時，都要幫助他六萬三千軍隊。德國以內的奧地利與普魯士的對抗，拿破崙還以為未足，要藉萊因聯盟造成第三德國，使德國人中間相互衝突、對抗，使統一為不可能。以後拿破崙打敗了，似乎民族自由的主張應當勝利了。但是一八一五年參加維也納和議的，不是人民的真正代表而是國王與外交家。恩格斯說維也納會議中，最小的王朝的利益，比最大的民族的利益，還要重要。德國還是如前的分裂。維也納和議只是種下許多社會震動和民族反抗的種子。

國外民族的壓迫和國內的分裂陷德國的經濟發展於可悲的狀況。鄰國對於德國都建立了關稅的高牆，抵制德國的商品。英國使德國不能對牠輸入木料和麵包。德國既分裂成許多小邦，即不能保護商人在國外的利益。萊因流域的工商業家在他們上普魯士國王書中說：『歐洲的一切市場都用關稅的牆壁對於我

正確的說，自一八一五年至一八三〇年，和自一八三二年至一八四〇年，各小邦在其憲法上所已許給中等階級的政治影響，在同上的兩個政治反動時期中，又從資產階級的手裏一點一滴的奪去，每奪去一點一滴，即用一些給資產階級的更實際的利益來交換。因此每個中等階級在政治上的失敗，緊接着就是他在商業立法方面的勝利。自然，在德國的工商業者看來，一八一八年普魯士的保護稅則和新成立的關稅大同盟，比較在小的王國的議會中之可疑的表決權爲貴重得多。他們在議會中表示不信任某閣員，其票數只有令閣員們看着發笑的。

德國資產階級的財富不斷的增進，商業不斷的擴張，他就到了一個階段，感覺着他的最重要的利益的發展，爲其本國的政治組織所阻遏：如像國家任意分裂爲三十六個王侯統治，各具野心和互相爭鬥；封建制度的鎖鍊束縛着農業及與之有關係的商業；糊塗和專擅的官僚階級對於一切交易都苛徵重斂。而同時，關稅同盟的擴張與鞏固，交連上一般的採用蒸汽，國內貿易之競爭發展，

接近，即是說牠自己的利益最要求國家的強大與統一。當時的貴族諸侯是最反民族主義的，即是他的利益與國民的利益全不相容。但是在革命的過程中，資產階級因無產階級運動的威脅而背叛革命，革命失敗，牠因資產階級的背叛，而失敗了，統一因之沒有完成。

『國家統一的完成，在一八四八年模糊的努力差不多到處失敗以後，很明瞭的，只有三條路存在。』恩格斯說。

『第一條道路是推翻一切分立的國家，實現真正的統一，換言之，即公開的革命的道路。這一條道路，當不久以前在意大利獲得成功，薩甫瓦王朝加入革命，因此得到了王位。但是德國的……霍亨索倫王朝……不能勇敢的走這一步。人民須得自己担任做一切的工作。由此就產生一種情形，除了革命驅逐一切諸侯，成立統一的德國共和國以外，沒有別的出路。……

『假使拿破崙第三在十九世紀六十年間對德人宣戰，萊因疆界問題尖銳的

資產階級）和工業無產階級的中間，這就決定他的性格。他總企望着達到資產階級的地位，但是稍稍橫逆的命運輒把這階級的個人投擲到無產階級的隊伍中去。在帝制與封建制度的國家，小資產階級的生存須仰賴宮廷和貴族的惠顧，若失去這些主顧，他的一大部份就要破產。在小城市中，一個兵營，一個縣衙門，一個法庭及與法庭有關的人，常常是他們興隆的基礎；沒有這些人，商店、裁縫、鞋匠、木匠等人們的生意就要清淡。因此，這一個階級永久是在兩個前途之間搖擺，一面希望躍入富有階級的隊伍，而一面害怕淪於無產者的生活；一面希望參加公共事業之管理，以冀提高其利益，而一面又害怕時機不宜的反對政府，反觸政府之怒而結果了他們的生存，（政府能去掉其最重要的主顧）。他們所有的財產既微，而其財產之不安定，又正與此財產之多寡成反比例。這個階級的見解是十分搖動的。假使封建或帝制的政府是強有力的，他便卑賤低頭，諂媚服從，假使資產階級剛剛得勢，他又轉到自由主義一方面。假

使資產階級已經獲得政權，他就瘋狂似的，沉溺於民主主義的幻想，但是當在他下面的一階級，無產者，企圖其獨立運動時，他又陷於垂頭喪氣的狀態，害怕消極。我們在以後會看見德國的這一階級，如何由一階段到另一階段的在那裏輪流轉換。

德國工人階級的政治及社會的發展，比英法爲落後，有如德國資產階級之於英法資產階級。相似的主人，相似的奴僕。一個人數衆多，強大集中，和有智識的無產階級的發展與一個人數衆多，富庶集中和强有力的資產階級之發展是相輔而行的。在資產階級的各派，特別是其進步的一派，即大工業者，未取得政權和依其需要改造國家制度以前，工人階級運動永遠不是獨立的，也不是純粹無產階級性的。只有在那一個時候，僱主與傭工之間的必然衝突，才變爲緊張，再也不能延緩；工人階級再也不爲那幻想式希望和那永不能實踐的諾言所欺騙，於是十九世紀的大問題，無產階級的解放問題，才最明顯而適當的顯

露出來。

德國工人階級的羣衆，不是如英國的一樣，受僱於近代的產業大王，而是受僱於小手工業者，其全部生產系統；僅爲中世紀時代之殘餘。正如在棉業大王和鞋匠及裁縫老板之間有極鉅的差異，同樣在新式工業區域的廣大覺醒的工廠工人和一個小城市的害羞的裁縫工人及木匠的中間，也有相當的距離。我們知道這些裁縫和木匠的生活狀況和作工的方法與他們五百年前的祖先是沒有多少差異的。因爲沒有近代的生活狀況和近代的工業生產形式，自然也同樣的缺乏近代思想，所以在革命爆發之初，大部分工人階級尙要求立即恢復行會，和中世紀的有特權的手工業組合，這是無足怪的。然而在近代生產系統占優勢的工業區域，因爲交通便利，因爲大多數工人由遷徙不定的生活，而得到思想上發展；於是在這些地方，有一種中堅組織的形成，他們關於工人階級解放的思想，是清楚明瞭，而且更符合於現在的事實狀況和歷史的需要，但是他們只佔

少數。假如資產階級的積極的活動，我們算他是從一八四〇年開始，則工人階級的運動是由一八四四年的西萊西亞（Silesia）和波希米亞（Bohemia）的工人暴動發端，我們在後面將敘述此運動所經過的許多階段。

最後，我們說到一大羣的農民，小農階級；他和農場勞動者算在一起，佔全國人民的大多數。但這階級內部又分成若干小的階級，第一是較富的農民，即德國人所稱的大農中農；他們是面積不等的廣大農場的所有者，每人都僱傭有幾個農業勞動者。這階級的地位既在那無捐稅負擔的大封建地主和那小農僱農的中間，他們顯然是以和城市內反封建的資產階級聯盟為其天然的政治路線。其次，小的自耕農，在萊因區頗占優勢，因為封建制度在那一帶早為法國大革命偉大的力量所摧毀。類似的獨立的小自耕農在別省到處也有，他們是會用錢贖回他們的土地所應納的封建式的賦稅的。然而這一階級只是在名義上為自耕農，他們的財產已經很多抵押出去，其條件之苛刻，等於說，土地的真正

所有者，不是農民而是重利盤剝者。第三，封建的佃農，他們固然不易被驅逐離開其農場，但須永久完租，或須永久力役，即替業主的農莊，做若干的勞動。最後，農業勞動者，他們在許多大農業公司的狀況，與英國的僱農階級完全一樣，由生至死，永久的貧困飢寒，為他們的僱主的奴隸。農民中這三個階級，小自耕農、封建佃農、和農業勞動者，在革命以前，從未間過政治，但是革命這件事使他們睜開了眼睛，看見了新的事業，前途充滿了光明。革命對於他們每個人都有利益，假使這個運動循正當途徑發展，他們每個都可望參加的。但同時我們應當明白，農民因散居於廣大區域，和他們中間得到大多數一致之困難，他們獨立運動的企圖永遠是不能成功的。他們需要城市中更集中的，更有知識和更易於行動的人民的領導和推動。

我們在以上只是簡單的敘述，革命運動爆發時，德國國家最重要各階級的構成，我們想，這已足以解釋，在運動中所發現的很多不連貫、不一致、和表

面矛盾的情形。當各派利益如此差異、衝突、和很奇怪的相互錯綜，而被捲入猛烈鬥爭的漩渦；當這些衝突的利益，在各省各縣的配合有不同的比例；特別是，國家無如倫敦和巴黎那樣的重心，其決定一切的重量，可以省去各個小的地方都要重複的進行爭鬥，去解決同樣的爭論；在這種情形之下，這種決勝戰除了化爲一大堆不相連繫的鬥爭，耗費鉅量的流血和能力 and 資本，仍得不到重要的結果，除此之外，我們還望能得着什麼呢？

德國在政治上分裂爲三十六個大小不齊的王國，也同樣是因爲構成國家的分子複雜和紛亂的關係，這些分子在各個小地方也是大同小異。凡無共同利益的地方即無統一的主張，更說不上行動的統一。自然，德國的大聯邦是被宣稱爲永遠不可分解的；然而大聯邦和其議會永遠沒有代表過德國的統一。德國的中央集權所達到的最高點不過是關稅大同盟的建立，即在這一點，北海一帶的小國自成一關稅同盟，奧地利亦有其自己單獨的保護稅則，德國實際上是分成

三個獨立的國家，不過比分裂三十六個小國，較勝一籌，因此認為相當的滿意，同時，俄國沙皇一八一四年以來所建立的統治的優勢，沒有因為這種關係而有所改變的。

我們既從我們的前提中得到這些初步的結論，在下一封信裏，我們將說到上述德國人民的各階級如何一個一個的開始行動，和這個運動，在法國一八四八年革命爆發時，帶着什麼性質。

——載於講壇報的一八五一年十月二十五日

(註)大陸系統 (Continental System) ——拿破崙第一欲藉經濟封鎖以鎮壓英國，故發表柏林及

密蘭宣言，禁止大陸各國和英國的通商。